

泛海书院丛书

重建中国经济学

程恩富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泛海书院丛书

重建中国经济学

程恩富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建中国经济学/程恩富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5.6
(泛海书院丛书)
ISBN 978-7-309-11442-3

I. 重… II. 程… III. 中国经济-文集 IV. F1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96090 号

重建中国经济学

程恩富 著

责任编辑/岑品杰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33.75 字数 610 千

2015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1442-3/F · 2139

定价: 6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程恩富简介

1950年7月生于上海，祖籍合肥；中国社科院首批学部委员、学部主席团成员兼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科院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和智库论坛召集人、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副主任；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曾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上讲课，多次出席中央领导召开的座谈会；上报的内参获得多位中央领导的批示。

担任全球学术团体——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会长和全国经济规律研究会会长；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国家和教育部的社科基金与社科奖的评委、国务院学位办学科评议组成员；俄罗斯彼得堡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10多所高校的荣誉或客座教授；主编五份重要学术期刊在中国和英国出版；论著被国内外期刊数千次引用；曾被国内外媒体数十次专题采访报道。

主要从事中外经济学和中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教学。在中、日、美、俄、越等海内外报刊发表500多篇文章，独著和合编30多本（套）书，是国内外知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理论家。其中独著《程恩富选集》、《经济理论与政策创新》、《西方产权理论评析》、《社会主义三阶段论》等；主编《现代政治经济学》（初级、中级、高级）、《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五卷本）、《文化经济学》、《经济学方法论》（中文版、日文版）、《中俄经济学家论中俄经济改革》（中文版、俄文版）等。首创政治经济

学“五过程法”新体系和大文化经济学体系，领衔改革的政治经济学课程被评为国家精品课程；独创性地提出和论证了“新经济人论”、“公平与效率交互同向变动论”、“知识产权优势论”、“当代经济基本矛盾论”、“社会主义三阶段论”等一系列理论和政策思路，被中、日等媒体称为“中国最有创见的经济学家之一”。

Contents

第一篇 中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

“马学”为体“西学”为用：重建中国主流经济学范式 / 3

论中国主流经济学的现代转型 / 10

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创新原则与发展态势 / 19

中国经济学理论模式的缺陷与全面重建 / 27

问题意识与政治经济学革新 / 34

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的两个主要假设 / 40

公平与效率交互同向论 / 53

论建立综合的社会主义经济学 / 59

现代政治经济学研究进展述评 / 66

近年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代化的若干走向 / 82

近十年我国政治经济学的两大理论成就 / 86

《资本论》总以新的方式登上世界舞台 / 89

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的思想探析 / 93

律师保密义务的经济学探析——海派经济学的观点 / 103

法律追诉时效制度的经济分析——挑战中外法学界主流观点 / 112

第二篇 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研究

我国现阶段的生产力状况及国际对比 / 131

略论中国经济发展绩效 / 138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辨析 / 144

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四个关键词” / 150

当前三大经济理论问题的争论 / 154

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 / 164

面对各种挑战,继续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机制 / 169

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 177

在改革中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学习《江泽民文选》的一点体会 / 186

完善所有制结构,构建和谐社会 / 192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模式构思 / 201

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及其职能的研究 / 209

国有制实现形式的发展变化 / 215

评析“国有企业低效论”与“国有企业垄断论” / 222

评国有经济退出竞争领域论 / 234

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与促进共同富裕 / 242

股份制国有企业改革效应分析 / 250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如何利用股份制——兼论国有经济的六项基本功能 / 258

大力发展多样化模式的集体经济和合作经济 / 266

社会关系网络企业新的资源配置形式 / 277

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理论解读与实践剖析 / 289

关于我国低消费率与消费不足的几个问题 / 299

关于我国企业职工权益保护状况的调研报告 / 306

“基础-主导型”调节机制的结合形式体系 / 324

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兼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双重调节论 / 333

完善双重调节体系:市场决定性作用与政府作用 / 344

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 / 356

市场和政府的功能强弱性及其互补作用 / 361

加快向充分自主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基于经济全球化视野的审思 / 368

第三篇 国外经济和经济理论研究

创建“世元”的可能性和实践路径 / 379

全球化背景下东亚经济转型与合作的战略选择 / 394

中韩经济增长特征比较分析 / 403

蒙德拉贡合作经济模式的经验及其启示 / 418

中美贸易中的知识产权壁垒——以美国 337 调查为例 / 431

西方国有控股公司及其产权经营 / 441

法人资本所有制的发展模式与性质 / 447

国际金融危机对资本主义生存与发展的影响 / 454

当前美国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若干新变化 / 461

当前西方资本主义危机引发的困境及其出路 / 469

当前西方金融和经济危机与全球治理 / 477

从巅峰跌落的资本主义探寻新出路——2012 全球马克思主义发展述要 / 485

从“占领华尔街”反思资本主义制度 / 489

当代外国学者对新保守主义经济思潮的研究 / 492

评萨金特的宏观经济因果实证研究 / 502

基于席勒资产价格分析重新界定通货膨胀 / 510

冯·维塞尔的社会经济学与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 / 520

后 记

“马学”为体“西学”为用：重建中国主流经济学范式

第一篇 中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

“马学”为体“西学”为用：重建中国主流经济学范式

最近,中央领导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现状整体看来也处于一个关键阶段,前苏联的蓝本有很多不适应。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尚未形成。西方教材乘虚而入,正确的态度应是批判地接受。哲学社会科学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中国在和平崛起,这是一个奇迹,我们有资格、有条件形成我们自身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要编写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要编写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①这一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战略的总体精神是正确的。

就理论经济学来说,世界主流经济学是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而中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是非主流经济学;社会主义中国的主流经济学是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西方经济学则是非主流经济学。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可能将资产阶级执政党奉为主流的经济学作为本国主流经济学的^②。同西方经济学一样,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是学术体系,又是一种理论信仰和意识形态,应当在学术和意识形态两个领域都发挥指导作用。如果只赞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而不赞成它在社会科学中的学术指导地位,则会架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过,要搞清各国政界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学界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本质联系与某种差别。日本学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几个学派,与日本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就存在异同点(展开地说,日本的官方经济学与学界多学派的经济学就有一种互动和互补的交互关系,罗斯福新政、里根经济学和布什经济学同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也有某种选用和综合的关系,而主要不是学界经济学拥护和赞美官方经济学)。理论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它与一定的意

① 参见《我们有资格有条件形成自身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上海宣传通讯》2005年第3期,第18页。

② 马艳:《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流地位及其创新》,《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识形态相结合,但不能仅仅是对官方意识形态的注释和解说。同时,繁荣与发展理论经济学,需要创立不同的学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内部也应形成不同的学派。学派的形成是学术繁荣的重要标志之一。学界的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理论必须多学派地发展。在西方资产阶级“话语霸权”和学术强势的新形势下,最不明智的学术和意识形态引导和评价,是管死马克思主义多学派的发展,放活非马克思主义多元化的扩张,视在西方主流理论经济学刊物上发表文章为最高学术水平,并给予重奖,而不支持甚至贬低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刊物上发表文章。这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迫切需要改进的最重要措施之一。

2000年,笔者在学界提出“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以中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体,现代西方经济学为用^①。去年以来,中国社科院刘国光教授也使用此提法,并严肃指出:“部分传播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人士,力求使它在中国也居于‘主流’地位,取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种情况需要关注。”^②这与后来河南财经学院杨承训教授强调的“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马克思经济学为魂,中国特色的现代政治经济学为体,现代西方经济学为用)的观点,也非常相似^③,但与主张“西学为体,马学为用或中学为用”的观点反差较大。北京大学已故经济学家陈岱孙教授生前为笔者的《西方产权理论评析》一书题词所说的“弘扬马列锐意求新借鉴西学体察国情”^④,也是一个科学处理现代政治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关系的指向。近年,除了胡代光、陶大镛、高鸿业、吴易风、丁冰等资深教授和“老海归”,又涌现出中国社科院左大培和许建康、北京大学王志伟、西南财经大学任治君、日本岛根县立大学张忠任、华南师范大学方兴起等知名教授和“中年海归”,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孟捷、北京大学余斌、上海财经大学朱奎和薛宇峰等经济学博士和“青年海归”,这些专门研究西方经济学的老中青学者也基本持上述观点,同专门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老中青学者一起,形成了日益壮大的现代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学术阵容。

那么,我们究竟应当怎样科学地重建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就是说,依据什么思想方法和理论原则来创新呢?或者说,笔者和复旦大学张薰华教授等创立的“海派经济学”即“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的发展思路是什么?我们主张,以中外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为思想源泉,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要假设为基点,积极吸纳古今中外各种经济思想的合理成分,广泛借鉴相关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

① 程恩富:《重建中国经济学:超越马克思与西方经济学》,《学术月刊》2000年第2期;日本经济理论学会主办《经济理论研究》2004年第1期。

② 刘国光:《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答辞》,《社会科学报》2005年4月21日。

③ 杨承训:《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人民日报》2004年11月25日。

④ 参见程恩富:《西方产权理论评析》,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可用方法,构造既超越马克思经济学范式和苏联经济学范式,又超越现代西方经济学范式的新范式,即新建在世界经济大环境中主要反映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性的经济学范式。它本质上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经济学。

第一,中外社会主义经济多种实践是思想源泉

经济实践是经济认识的基础和检验经济学真理的唯一标准,科学的经济学理论永远是在经济实践的基础上产生,并随着经济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经济实践的内涵丰富多彩,并非单指一国一时一地的具体经济活动或实践。然而,人们在辨别某一经济理论的正确与否时,往往固执地引用某一时空范围内具体经济实践的案例来确立检验其真理性。局部的或短期的经济实践并不能全面检验某一经济学原理的正确性。从这个角度说,当代西方哲学中关于理论只能被“证伪”而不能被“证实”的认知方法有一定道理。即使是科学的经济学理论,也只能不断地被部分证实下去,而不可能通过一次或若干次具体实践就得到全面和永远地证实,但证伪只需一次,也许这一证伪只具有个别或局部意义。

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能否有效结合的重要命题为例。国内外许多学者对此都持否定意见,并援引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苏东国家改革后的蜕变和我国公有经济比重下降来佐证。其实,与西方产权学派张五常在此问题上混乱的逻辑相比,该学派的创始人科斯讲得比较客观,指出过去已有私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经验,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能否相结合,这一点目前不能证伪。观察中外现有市场经济实践的表象和本质,可以部分地得到实证的说明,即社会主义或公有制与市场经济能有效结合,而苏东国家的经济大倒退和西方国家的金融危机等,恰恰表明资本主义或私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冲突和某种不相容。

重建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必须以世界经济和人类经济的发展历史为大背景,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多类模式相对照,重点从中外社会主义经济的多种实践中实证地描述出经济事物变动的基本现象,科学地提炼和抽象出合乎经济事物本质的规律性范畴和原理。尽管恩格斯揭示过不成熟的经济关系与不成熟的经济理论之间的内在联系,但这并不妨碍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某种前瞻研究。事实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转及其体制的不断完善,正有赖于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变革与创新。即使是作为中国经济史的计划经济实践,也需要继续进行客观的实证分析和辩证的规范性,以便成为新经济学的经济史基础。

第二,马克思经济学的主要假设是理论基点

在19和20世纪,社会主义的定义有100多种。其中有资产阶级右翼和左翼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激进社会主义、空想或批判的社会主义,也有马克思主

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既然要从根本上反映作为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代表的工人阶级利益,那就必定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理论指南。如果对以往“左”的教条主义采取矫枉过正的学术态度,便容易形成一种善意的折中主义或保守的右倾思潮,以为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只应进行“问题”的实证分析,而无须进行含有“主义”的价值判断;或者以为当代西方经济学教科书都是普遍真理,只要加点中国经济实例即为创新的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其实,每个经济学流派均或多或少地确立了特定“主义”的价值判断。斯密主义与李斯特主义、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等等,难道没有价值判断的“主义”之争?所以,症结不在于要不要“主义”一类的价值判断和思辨,而在于其客观性和科学性如何。

过去,由于人们强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真理性和现实性,因而一律偏好使用“普遍原理”或“基本原理”之类的词汇,不愿或不敢退一步,把其某些经济思想同时也视为一种“理论假设”,似乎假设都是脱离实际的或无意义的空想和幻想^①,进而贬低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的重要性。出于同当代西方经济学对话或论战的需要,应当改变近代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用语习惯,经常采用“理论假设”一词及其逻辑叙述方法。如同西方经济学同时把“生产三要素”“私有高绩效”“经济人”等说成是原理、公理和假设一样,我们也可以把“劳动二重性”“公有高绩效”“利益人”等说成是原理、公理和假设。在某一经济学理论假设算不算作公理的问题上,渗透着研究者主体的不同价值判断。基于不同的方法和立场,即使马克思主义者拿出再硬的实证史料和逻辑证据,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不一定承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理论是正确的,但会确认其为理论假设,这有益于讨论的简化和深化。

此外,马克思经济学、列宁经济学中某些被资本主义或前资本主义经济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理论,以及属于对向社会主义过渡或社会主义的理论分析,均必须在中外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中进行检验及展开逻辑体系的完善。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原理、公理或理论预见,不妨都可称之为理论假设。

简言之,采用马列主义经济学的“劳动二重性”“公有高绩效”和“利益人”(与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或“自私人”不同,“利益人”是利己与利他相结合的)等主要假设为理论基点,积极包容古今中外合理的经济思想,并由此构筑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新假设和新范式,便能实现超越马克思经济学、苏联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创新目标。

例如,从马克思经济学中概括出来的“公有高绩效”假设,是指生产资料归全

^① 刘国光:《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答辞》,《社会科学报》2005年4月21日。

社会成员共同所有的公有制体系能达到社会绩效最大化;从邓小平经济理论中概括出来的“公有高绩效”假设,是指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能达到社会绩效最大化。但其中均存在多种复杂的假设前提,如不存在严重的社会腐败、委托代理双方权责是合理的、国企承担额外社会义务须另行核算、政府政策和操作没出现大失误、选聘的经营者有较高素质,等等。只有大体同时具备这些前提条件,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才能呈现高绩效。倘若过去或现实生活中搞好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假设条件不存在而导致低绩效,这并不能证明计划经济或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公有制经济不可行。可见,重建中的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必须借鉴西方经济学表述“科斯定理”“帕累托最优”或“市场效率假设”等方式,精心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典和社会主义新经济理论所必然涉及的这类假设及其前提条件,大幅度提高理论的科学解释力和预见力。

第三,古今中外经济学说的合理成分是学术渊源

广义地说,沿用式的继承、批判式的发展和否定式的摈弃等,均呈现出某种学术渊源联系。狭义地理解,也可将学术渊源界定为一种学术与另一种学术相互继承和发展的来源关系。重建中的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不能采取传统的做法,只强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典作家的学术地位和渊源关系,而盲目排斥其他;或者反过来,只强调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经典作品的学术作用。经典是必须拥有和重视的,但仅仅拥有经典是远远不够的。

综观人类经济理论变迁的历史,任何一种新的经济学术体系均难以彻底抛弃前人的思想,而往往是将超越和创新同继承有机地结合起来,在不同程度上有扬有弃。不仅穆勒、马歇尔、萨缪尔森等近现代经济学说的综合经济学家,李嘉图、弗里德曼、诺思等创立了新学派的西方经济学家,而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和邓小平创立和发展的科学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都一概如此。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重建,应在保持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要学术渊源关系之外,放眼世界,综观历史,积极汲取古今中外一切经济学说的合理成分,并实现某些理论原创。其重点有两个:

首先,创新的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必须科学地汲取当代外国经济思想。现代主流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西方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理论,自然要高度重视,但也不能轻视发达国家非主流经济学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说。譬如,美国的激进政治经济学和加尔布雷思的制度主义,英国的凯恩斯左派经济学,发展中国家的“中心-外围”“依附”和“不平等交换”等国际贸易理论,日本的非正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以及关于经济全球化悖论的经济思想,等等。其中,西方各国激进政治经济学家和左翼经济学家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各种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对我

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具有较直接的借鉴意义。

其次,创新的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必须科学地汲取中国古近代经济思想。我国古代的消费思想、人口思想、财政思想、生态经济思想,康有为的社会主义“大同”经济学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经济理论等,均有一定的合理颗粒。我国台湾地区学者构建的“新儒学经济与管理”思想体系、加拿大华人学者倡导的“中庸经济学”理论,也值得高度关注。

第四,相关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可用知识是新颖方法

马克思精通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但在最后构建《资本论》三卷本政治经济学新体系时,并未主要沿用当时西方经济学的一套方法,尽管这些经济学方法也曾被视为学术前沿和最新工具。这是因为,马克思要实现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充分革命和全新超越,决不能囿于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那套新方法。事实上,马克思在重视以往经济学方法论的同时,重点是批判地借鉴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论,采用原创的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来改造政治经济学旧程式的。

要真正实现同时超越马克思经济学和现代西方经济学,必须学习马克思的这一独创精神,突破中外政治经济学说史上的某些方法局限,在重建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过程中广泛借鉴和采用相关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可用知识,做到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有机整合。例如,借鉴现代哲学的方法和知识。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包括科学哲学在内的哲学方法对理论经济学的功用将逐渐凸显为最大和全面性的。人本主义、解释学、总体异化论和范式说等,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又如,借鉴现代政治学的方法和知识。尽管政治经济学名称中的“政治”原意并非指现代意义的政治(目前西方建立的新政治经济学又属于另一种含义),然而,理论经济学不是不要汲取政治学的营养。关于市场与国家或政府的关系,关于经济周期与行政推动或政治选举的关系,关于经济全球化与政治霸权主义的关系,无不需要结合一定的政治学方法和观点去透彻地解释之。再如,借鉴现代美学的方法和知识。美是事物具有的某种形式、结构、属性和法则,是一种能产生某种美感的客观性质。经济活动中存在美与丑的现象,也有股市这类“野兽之美”的状态。“经济美”可归属为与自然美相并列的社会美范畴,是指人类经济活动中具有制度公正、运行有序和发展和谐等属性,对于当前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经济学美”是指经济学理论体系形式上的完整和谐与该理论所揭示的内容上的完整和谐。应当用中外美学的某些思想来提高理论经济学的科学抽象度和学术品位。此外,要借鉴系统论、信息论和场态论之类的方法和知识。依据系统优于非系统的特性,将经济对象和经济行为作系统化分析;依据层